

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什么突破”。作为治学严谨的史学工作者,“踏实的科学研究”既包括对历史的分析,也包括对现实的研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发言中强调:“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应当就是全面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加上全面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来攀登上一个全新的制高点,回答人们期望得到回答的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的问题。”^①这种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一旦与严谨的治学紧密结合起来,自然会使作者创作出与那些“知今不知古”、“知古不知今”或者只关注某一狭小范围的学者风格迥异的作品,而如此“通古今之变”的作品也自然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深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而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刘大年毕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的深层缘由和动力所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努力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既能够客观全面地分析历史,又能够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内核。当然,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他对于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的认识,也远不止以上所论。但无论如何,如何汲取前辈智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应是我们探析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最大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守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阵地上

——由刘大年的《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说开去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1999年秋日,时值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世人心绪纷繁,展望与回眸相伴,欢乐与惆怅共生,历史学家尤然。

9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只见一位老人,用枯瘦的双手,捧着他的发言稿,在台上一板一眼地声言:“我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的。”这位老人就是刘大年,此时他已84岁高龄,且重病在身。羸弱不堪的他,仍抱病莅会,以坚定的口吻,发出了世纪末的强音:“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摒弃教条主义,不把自己变成‘古之人!古之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应当就是全面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加上全面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来攀登上一个全新的制高点,回答人们期望得到回答的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的问题”。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出自刘大年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他有力地回应与批驳了世纪末盛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后学指点迷津,为世纪末的中国学界抹上了一片亮色。

可叹天不假年,三个月后,刘大年与世长辞,距新世纪只有3天。他留给后人的史学遗产丰厚,他的学术贡献璀璨而光耀,像刘大年这样一生服膺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毕生奋斗不已的历史学家,在当代中国史坛并不多见。个人因限于学识,限于自己的学科领域(笔者是从事

^① 《刘大年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代前言),第5页。

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只能就他的一篇宏文《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对其史学及成就略说一二。但愿这种“跨界”,能够打破“楚河汉界”,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之外,开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

《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文写成于1985年。这篇华章是有为而发,有备而来,这要说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被誉为“历史学的奥林匹克”。它始创于1900年,是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就与它有了联系,1938年8月胡适代表中国史学界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成了该会的成员国,后来因战乱失联,1949年后又恢复联系,1980年派观察员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重新入会,1985年8月,刘大年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首次作为成员国参加了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学术研讨会分为三大部分:重大课题、方法论和编年史。很显然,《论历史研究的对象》正是为回应大会“方法论”这一主题而作,在结集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是首篇文章,共90页,完全可以独立成书。阅读这篇长文,我感到很亲切,因为这里面讲的内容与我从事的专业领域十分契合,虽则作为晚辈,没有像张海鹏或姜涛那样有直接聆听教诲与相互交流的机会,但我觉得此刻“以文为师”,我与这位前辈在心灵上也是相通的。

历史研究的对象为何物?刘大年在《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文开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要科学地认识历史,它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切实回答的问题。”是的,史海茫茫,要对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理出一个头绪,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寻求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谈何容易。因此,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也是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阅读《论历史研究的对象》,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色。认真而仔细地进行史学史的梳理,是该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刘大年的学科回顾分为三种(或三类):第一种,历史研究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第二种,凡过去的一切事物全部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三种,历史上某些事物、领域或某种状况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在研讨第三种时,作者又对“人/人事对象说”、“社会对象说”、“结构对象说”、“文化对象说”、“综合史观与分散史说”、“规律对象说”等等做了评述。回顾是反省的前提,也是开拓与创新的基础。反观时下有坐而论道者,对某一方面的史学史工作做得还不深入,就急于评头论足,哪有不错之理,遑论切中肯綮。刘大年的这种治史态度与方法,当为我们学习借鉴。

介绍先于批判,批判也应还其原来的科学意义,这是该文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我们曾经历过极“左”思潮横行的时代,那时一个学术观点或一纸短论,动辄就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的帽子而遭到口诛笔伐,对来自西方的东西,更不分青红皂白就一棍子打死。刘大年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在痛定思痛之后,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下,这篇文章明显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着力践行了“介绍先于批判”、“批判也应还其原来的科学意义”这一原则,如在文中说到现代美国新史学派鲁滨逊、兰克学派始祖兰克、文化形态史观集大成者汤因比等西方史学家时,公允而平实,迥然不同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界对他们横加指责与全盘否定的态度。批判,决不是恶语相向与棍棒相加,而是还其科学与求真的本义,刘文做到了。

笃信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方法上均全力贯彻,这是《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文最令人瞩目的特点。该文在清晰地梳理出前人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各家各派后,用大量的笔墨论

证了四个问题:判别历史研究对象的根据、从社会关系及其运动考察历史研究的对象、私有制时代的社会关系及其运动、阶级划分与现实统一但又不绝对统一的问题等。作者视野开阔,学贯中西,以翔实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阐发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员所认为的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文章最后,他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这样的小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确认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及其运动,事情就截然不同了。它找到了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的前提。社会阶级、社会关系体系不但是客观地存在的,它的范围明确,内容主次分明。以前人们有时拿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社会经济的规律来说明历史的运动。它们或者失于宽泛,或者失于狭窄。辨明研究的对象以后,就可以确切去探寻历史运动本身的规律了。”这些话语是在30年前说的,作者强调了历史客体是历史研究的直接对象,虽尚未深入探讨作为历史客体抽象的历史主体,或者说历史学家重构历史客体时的主观意识,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既有史学史上的学术价值,也有启示现实的理论意义。正如刘大年在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序言中所说:“应当想到,椎轮不过是大辂之始,往后必定一次胜过一次。有个东西作比较,那时回头来看,就知道前进了多远。”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再出发,总是在前人止步的地方,上文说到了回顾与创新之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这也是唯物主义所应恪守的一项准则。

刘大年一生著作等身,其《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是他学术园地中的“冰山一角”。正如他的弟子姜涛在读《论康熙》时感言:“首次领略到一种气势,一种只能出于历史大家笔端的宏大历史感。”我在读《论历史研究的对象》时,也有同样的感受,也为它的“气势”、“历史感”所震撼。

其一,由《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联想到刘大年的全部学术生涯。记得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从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的金冲及老师那里得知刘大年著有《美国侵华史》,后在旧书店里买到这本书,这是我读过的他的第一本著作,以后也浏览过他著的《中国近代史问题》及其他文章。他是一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的导师耿淡如先生曾把历史学家分成四种:历史编纂家、历史思想家、历史编辑家、历史文学家。以前我想,刘大年当属历史编纂家。如今看来,不完全对了,他对历史理论的思辨与历史叙事的书写同样出色,这从《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到《刘大年集》(2000年)等书的文稿中可资佐证。称他是“历史编纂家”与“历史思想家”兼具的“两栖型”史家,想来是合适的。

其二,由《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联想到刘大年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的贡献及重大影响。这主要是指他在中国新时期的论著及业绩。经过“文革”结束后七年左右的拨乱反正,至1983年史学理论界出现了新的转机,其标志是历史学自身理论建设的提出。1983年,刘大年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历史学本身的基本建设;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等同于历史学科自身的理论。个人认为,他的上述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自此开始,历史学走上了构建自身理论的坦途,用1983年《世界历史》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怒放》这一篇名,来形容当时史学理论界的欣喜雀跃之状,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刘大年是这一新论与新潮的提出者之一,也是一位全力推动者,据《刘大年传》(周秋光、黄仁国著,岳麓书社2009年版)记载,自1983年以后,他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草拟了一份“十论书提纲”。本文所论述的《论历史研究的对象》正是这一计划中的佳作。还需补白的一点是,如今看来,正如上文说到他在论述历史研究对象时格外强调历史客体,尚未对历史主体作细论,他所阐述的史学理论,仍然着重于历史理论(即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知),而未及深入

探讨史学理论(狭义的,即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身的认知)。如果他计划中的《十论书》由构想化为现实,那就全面了,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一说。无论如何,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册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其三,由《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联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它的代表人物 E. P. 汤普森。放开眼界,从横向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虽一度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革故鼎新,一边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边借鉴当代海外史学界的成就,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路,这从刘大年 1985 年率团出席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良好反响,足可证明。

刘大年在 1978 年至 20 世纪末活跃于史坛,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且出彩的时期。据我个人考察,刘大年与 E. P. 汤普森,这一中一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那种对现实的关注,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是如此地相同;刘大年在抗日战争中当过一年多八路军战士,在前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张海鹏称其为“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E. P. 汤普森也在二战中“投笔从戎”,走上前线,当过三年战士,抗击德意法西斯,也是个“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他们两人对马克思及其唯物史观的守望,更是如出一辙。且看:1992 年 3 月 4 日,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已沉病缠身,在抱病接受中国学者刘为的访问时声言:“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久后,他与世长辞,留下的这句声言超越时空,7 年后,与 1999 年 9 月 24 日刘大年的声音合拍,响遏行云,在历史的长空中久久回荡……

行文至此,时已深夜。搁下笔,在阳台上望着初秋的夜晚,只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星座里,群星闪耀,我们找到了守望者 E. P. 汤普森,也找到了守望者刘大年……

求真求实 学者本色

——追忆大年同志与抗战史研究

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中,近代史研究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其厚重扎实的学风中不乏创新的敏锐与灵气,求真求实的精神自然地流淌于学问之间。近代史所的这一优良学风是一代代前辈学者以言以行而铸就而传承的。刘大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我于 1986 年进入近代史所。作为晚生后辈,在最初的几年中,我与大年同志少有见面。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因参加大年同志组织编写的《中国复兴枢纽》一书的写作,才有了与他直接接触的机会。当时,为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组织编写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大年同志出任编委会主任。除统筹全套丛书的规划外,大年同志对被称为“丛书之纲”的《中国复兴枢纽》一书投入了较大精力。该书的初稿系由多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写成,大年同志对初稿质量不太满意,遂从近代史研究所抽调一批研究人员进行改写和补写。当时尚称中青年研究者的姜涛、闻黎明、杨